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08年11月12日,日本东京学习院大学,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形象大使郭晶晶(中)与中日青少年一起唱《明天会更好》。当天,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日方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陈剑/摄

##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降落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而田中首相来说,他是顺着民间交流铺好的轨道一路走来的。

### 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在北京,中日双方要谈判的最重要文件,是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连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四个重要政治文件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被称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中日两国政府开始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是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来京之前就与中方达成的共识,两人从政治上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上解决中日邦交问题的表述,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欣赏。周恩来说: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是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这也成为此后中方在处理台湾问题和日台条约时秉持的基本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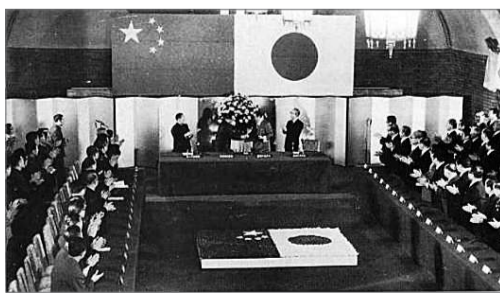
1972年9月26日上午,在中国外长姬鹏飞和大平外相首轮会谈中,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拒绝承认日台条约非法和无效,坚称无必要对该条约中已经涉及到的双方战争状态宣告结束,日方已经放弃对台一切权利和台湾当局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等内容的重复写入联合声明,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生气,并严正质问日方。在曾任中国驻日使馆政务参赞王泰平的回忆录里,周恩来曾两次提到,中方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许多资料记载,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再次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成立的前提,是周恩来坚信中日双方能够友好。

在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里,1972年9月29日的北京风和日丽,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都沐浴在晨光里。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举行记者会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

这是一次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从田中内阁成立到完成中日正常化准备工作,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从1972年7月7日田中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到9月29日签署联合声明,只用了82天。但在这个闪电般速度的背后,是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到中日关系时表示,希望日本社会能真正树立起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真正打牢有利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民意基础。中日友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1972年在《沁园春 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结尾中所期许的那样,“从今后,望言行果,和睦万邦”。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资料图片

己整个人都昏了。他称赞周恩来身似杨柳,心如巨石。

竹入带回日本的记录,后被称为“竹入笔记”,让田中角荣吃下了定心丸。在上海芭蕾舞团离开日本的前一天(1972年8月15日),他终于抛开一切顾虑,在东京帝国饭店亲自接见了团长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接受访华邀请,并准备在9月下旬或10月初成行。田中还表示,希望通过访华一建交。

在曾做过周恩来翻译的林丽辑印象里,当时日本自民党内有一批亲台的极右势力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是排除万难来北京的,总是把独生女田中真纪子带在身边的田中首相,在首次访华特地把她排除在名单之外,真纪子后来回忆说,父亲当时来华已经做好了被日本极右势力暗杀的心理准备。

1972年9月25日11时30分,在尼克松访华7个月,战后首架日本首相专机

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2年日本政府与台湾签订的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20天后,周恩来在北京见到了自称替田中政府前来探底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义胜与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均有不错的私交。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拟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三项口头默契,请竹入向田中传话。周恩来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方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考虑到田中刚上台面临的内部压力,中方所谈内容中也暂时没有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要求,《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必须撤走驻台湾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同时让台湾大使馆和领事馆撤出日本。

竹入后来接受日媒采访时回忆说,当他听到周恩来说出“日本侵华战争是少数人惹出来的,不应该让人民来负担”时,自

时,东京民众正沉浸在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掀起的芭蕾舞旋风中,日本民间呼吁两国恢复邦交的声音已十分高涨。

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与中方共同发布了中方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公告。在曾追随美国玩弄两个中国阴谋的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看来,这等于是美方对日本来了一次“越顶外交”。曾任《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的古川万太郎评论说,尼克松冲击波让日本领导层辨别方向的神经已经完全麻木。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大平正芳出任外相。田中角荣一上任,立即着手打开日中关系这一紧急课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他即提出,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田中特别强调,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

订了互设办事处和互相派驻记者的协定。这为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间阶段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那之后,松村和高碕多次奔走于日中之间。苦于战后两国间没有直航,他们只能绕道香港再辗转飞往北京,最快也要两三天时间。1964年松村第三次访华时,因不愿再绕道香港,决定乘货船从日本门司港出发直到秦皇岛。他们曾期盼有朝一日可以从东京直飞北京,但令人唏嘘的是,后来中日直航开通的时候,两位老人却已作古。

1972年9月宴请古井喜实等人时,周恩来在致辞中引用了“饮水不忘掘井人”这句古语,感谢长期致力于中日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的日本老朋友。

### 顺着民间交流铺好的轨道一路走来

田中角荣 1972年7月当选日本首相

### 中日邦交正常化大事记

1952年6月1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国会议员高岩、帆定、宫腰喜助一行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破美国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一个缺口。
1954年10月	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1971年10月2日	中国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的“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必须废除。
1972年9月25日-30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举行会谈。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1月11日	日本驻华大使馆建立。4月3日,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向董必武递交国书。
1973年2月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建馆。4月5日,中国首任驻日本大使陈楚向裕仁天皇递交国书。
1978年8月12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制图:张玉佳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六年与一秒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中日复交“分两步走”的主张,是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提出的。1972年接见自称替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探底的日本公明党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主张,后获日方同意。这个“两步走”是:先发表联合声明,再搞一个和平友好条约,先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再以法律形式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将其上升为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律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保持定力和掌握大局的战略眼光。

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并发布象征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中明确写道: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随着两国关系此后的顺利发展,中方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之际,以时任中国外长乔冠华的名义致函日本时任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周恩来当时明确强调,和平友好条约要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来写,还特别提到联合声明第七条的内容,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时,因为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日本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直至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正式缔结之前,是否要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主要分歧,也是谈判一度停滞不前的根源之所在。在最后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正文中,相关部分以中方同意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内容而各得其所。

条约全文虽不足一千字,但从酝酿到缔结历时六个春秋。其间,中日双方各自国内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换。前后6次常驻日本的资深外交官王泰平后来曾撰文感慨说,中方当事人先后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经历了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

与前后6年的漫长谈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和平条约谈判期间,接任周恩来领导和主持国

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一秒钟理论”。

1977年9月,两个月前刚刚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会见中,邓小平抓住新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很快传到了日本,极大鼓舞了一批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也为谈判向前推进按下了“加速键”。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邓小平1978年8月会见应邀访华的日外相园田直时,充分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求大同、存小异”的灵活的外交方针。他提出,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王泰平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缔约成功,迎来了一个满意的结局。

责任编辑 / 高鑫诚 版面编辑 / 张蕾 图片编辑 / 陈剑 美术编辑 / 张玉佳

